

《山海经》里说海南

■ 吴辰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山海经》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它虽不在“四书五经”之列，却备受人们的重视；它虽备受人们的重视，却至今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其作者是谁、成书于什么年代。大而化之，这是一部古代地理著作，但是究其细节而言，就连著成《史记》的司马迁也直呼“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通篇皆是在写那些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之事，却又都言之凿凿，书中记风土人情、山川河岳或是草木虫鱼，无论是谈分布、标地理还是描样貌、摹习俗都详尽备至，甚至于其中还记载着不少有关各处物产的利用方式。通读《山海经》，其中的一些内容早已超过古代人的认知能力，一些内容更是仿佛需要放置在世界地图的大视域中才能理解。

所谓《山海经》，自然分为“山经”和“海经”，较之“山经”，“海经”则更为丰富，大海之外更有“大荒”，真可谓是光怪陆离、异彩纷呈。沿着《山海经》所勾勒的路线，从“招摇之山”一路探寻下去，很多人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家乡，人们很难不相信曾经有过一群博闻强识的先贤，在不知什么时候就曾经周游过世界，并且将所见所闻以一种近乎神话的方式记载了下来。



《山海经广注》(康熙六年新铸本)

离耳未必真儋耳

在《山海经》中，有一篇“海内南经”，这篇以“海内东南陬以西者”起笔的记录中标注了诸如“瓯”“闽”“番禺”等至今人们仍耳熟能详的地名，顺着这条路线一直向南走，就会发现一则记载“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这段话初看没什么，但是经过晋代人郭璞的一番注解，就变得有意思起来。

说起郭璞，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乃是一代风水大师、游仙诗的始祖，他一生曾游历名山大川，并为包括《尔雅》《周易》等多部经典作注，可谓是学富五车。在为《山海经》作注的过程中，郭璞特别注意到了离耳国和雕题国，称离耳国“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金，但噉蚌及蘋黄也”；雕题国“点涅其面，画体为鱗采，即蛟人也”。郭璞

的注自然不可能完全准确，后世也有许多人对其雕题国即鲛人的说法进行过辩证，但是，至于离耳国即是晋时儋耳郡的说法却如板上钉钉，言之凿凿。

自汉代儋州设郡以来，儋耳以耳大得名的传说就不曾中断过。《水经注》中记载：“汉设九郡，儋耳预焉，民好徒跣，耳广垂以为饰”，《后汉书》也称“其渠帅广长耳，皆穿而垂之，垂肩三寸”。而《儋县志》更是夸张，称“其人耳长及肩，每逆风走，则将耳反搭于上，使不窝风”，此言虽看似无稽之谈，却在时间的加工下几乎成为了定论。而事实上，在耳框上加以坠饰使其下垂的风俗在中国古代南方民族中流传甚广，凭什么儋耳可称之为“儋”而其他地方则不能呢？1960年代，郭沫若先生曾经两次来到儋州，通过对《儋县

志》的点校，他发现以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儋州之“儋”更为合理，并得出“儋与珠崖是一音之变，急言之则为儋，缓言之则为珠崖”的结论。这样看来，儋州虽然自古也有垂耳的习惯，但是地名之中的“儋”却未必与大耳有关。

这样看来，《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离耳国未必特指儋州一地，将离耳国置于海上也只不过是郭璞的一厢情愿罢了。虽然是这样，但是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对儋州风俗的描摹却是极其准确的，不餐五谷、种植薯蓣、喜食贝类这些习俗一直到宋代苏东坡被贬儋州时还依旧有所保留。苏轼在儋州尤爱吃蚝，甚至不愿与人共享；而至于薯蓣，他更是为之创造了一道“玉糁羹”，并写诗赞曰：“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海南即是“山海经”

如此看来，与离耳国相邻的雕题国也未必就是特指古代海南黎族同胞了。

《礼记·王制》篇中记载到南方民族时称其“雕题交趾”，可见，“雕题”并非是某一特定民族的习惯。有关“雕题”，有人解释称“题，额也，雕之，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纹面。与垂耳相仿，雕题也是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南方民族中的一种风俗。

而为《山海经》作注的郭璞显然也对雕题有着一些误解。郭璞想必是受到了《左传》中太伯和仲雍来到吴越之地“短发文身，裸以为饰”或《淮南子》中“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断发文身，以象麟虫”之说的影响，想当然地将南方民族的纹面当成是水中作业时驱害护体的文身，并将这些雕题的民族称之为“鲛人”了。

《山海经》虽然是一部奇书，但其中对风土人情的记载毕竟虚无缥缈，我们究竟无法坐实所谓离耳国、雕题国是否位于海南，但是，就海南而言，其存在本身就是一部“山海经”。海南四周是海，中部群山矗立，在山海之间是海南丰富的物产与灿烂的文化，山和海象征着海南人的精神，既稳重又开放、既坚定又包容。如今，在自贸港建设的大形势下，海南正在创造着新的传奇，生活在海南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部新时代的山海经上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元朝曾办诗歌奖

■ 徐爱清



元朝诗歌大奖赛第二名获得者高启。

元朝至正年间，曾经举办过一次诗歌大奖赛，其奖金数额堪与诺贝尔奖媲美。

那时，虽近元末，尚未天下大乱，东南沿海，物阜民丰，江南一带，富甲天下。即使后来张士诚割据吴中，自称诚王，政权相对稳定，统治也相对宽松。张士诚私盐出身，却是一个文学老青年。热衷笔墨，雅爱辞章，很喜欢在文人堆里，箕坐饮酒，唱和唱歌。他在苏州设弘文馆，开集贤馆，高阁雅座，延揽文士，管吃管喝，善待礼遇。故而苏、浙、淮、扬地区的诗社活动，经此提倡，风起云涌，煞是景气。

张士诚还专程征聘元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他的咨议参军，主持文事。元之行省，就是行中书省，等于是中央派出单位；而参政，官至二品，在地方上是拥有相当权威的人物。饶介官大，远不如他文坛领袖的名声大。饶介（1300—1367），江西临川人，字介之，自号醉樵。元末诗人，书法家，据钱谦益编《列朝诗集》称，“释道衍曰：‘介之为人倜傥豪放，一时俊流如陈庶子、姜羽仪、宋仲温、高季迪、陈惟演、惟允、杨孟载诸辈，皆与交。’衍亦与焉。”时人评他：“书似怀素，诗似李白，气焰光芒，烨烨逼人。”褒其诗曰：“如时花沐雨，枝叶都新。”誉其字曰：“飘逸流畅，清丽流放，神追大令（王献之）。”张士诚入吴以后，饶介杜门不出，这就是文人的清高了。可这样一位知名度高，号召力大，追随者众，影响面广的文学大人物，贩私盐的张士诚肯定早有所闻，立马拎了两瓶好酒，封了一份厚礼，亲自登门，请他出山。

饶介谦虚：一介微士，是做不来什么事的。

与那个视文人为敌的朱元璋不同，张士诚爱才如命，求贤若渴。只要先生大驾光临，就令吴门蓬荜生辉了。

据说，他加入张士诚政权以后，“采莲泽上，日以觞咏为事。”在此期间，他周围聚集了如高启、王彝、杨基、张简、徐贲、张羽……后来在文学史上称为“吴中四杰”“北郭十子”等一大批诗人，因为声气相投，同道契合，饶介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也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就有了这次声势浩大的文学大奖赛。大江南北，报名响应，应征作品，纷至沓来，成为当时文坛一大盛事。张士诚是个好热闹的人，最怕冷冷清清，饶介是个大气派的人，最怕抠抠吮吮，于是，政府出钱，咨议出面，官员染指，文人插手。那些日子里的苏州城，成为诗的世界，也成为钱的世界。任何评奖的最后，都是和实际利益挂钩的。

连后来官修的《明史》，都记载了这次的元朝文学奖。“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称醉樵。尝集大名士，赋《醉樵歌》，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白金三斤，次杨基，犹赠一镒。”现在已弄不清楚评奖当时的情况，但一等奖的奖金，与二等奖的奖金，其相差之悬殊，令人匪夷所思。

张简的《醉樵歌》，当然写得也是气势磅礴，但读得出来，这是一首为手不释杯的饶介量身定做的诗，或许这是他得以高置榜首的原因吧？但中国诗人都知道，在明代文学史上，得二等奖的高启，才是大明王朝第一流诗人。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认为高启为明初最杰出的诗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认为高启为明初“吴诗派”的开山鼻祖。

因此，一过性的文学奖，其时效意义对文学本质而言，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浪花泡沫，看似喧嚣，很快也就随风而逝。至于文学的优劣，至于作家的高低，只有时间，而且是相当漫长的时间，才能作出判断。



《月下泊舟图》

《月下泊舟图》是一幅中国画，明代画家戴进的作品，该画为卷轴，绢本，水墨淡彩。尺寸为59.5×42.5厘米。现收藏于美国明德堂。

戴进喜欢在山水景色中增添有情节的人物活动，可以视作以山水为背景的人物画，既有山水画之气势，又不乏人物画之生活情趣。此幅画面远景处，以浓淡水墨勾勒群山黯影，自左而右渐隐于淡雾中；一轮皎洁的圆月高挂于右上角夜空，水色月光交相辉映。近景处，湖边的芦苇随夜风轻轻摇曳，一渔翁侧躺在近岸的小舟中，酣然入梦。此画背景悠远辽阔，格调静谧安宁。远山近水，明月皎洁，渔舟静止，芦苇摇曳，渔翁酣睡，此外再无他物。细阅此画，似觉宇宙静止，万物俱寂，让人顿觉心如止水，滚滚红尘中的一切烦扰，全都随风而逝。

戴进（1389—1462），字文进，又字文节，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是明代宫廷一位技艺高超的山水画家，祖籍浙江钱塘（今杭州）。早年为制作金银首饰工匠，制作出的钗花、人物、花鸟，技艺精湛，很有名气。后改工书画，以卖画为生，年轻时就很有影响。宣德年间（1426—1435）被推荐进入宫廷画院，官直仁殿待诏，当时画院画家如谢廷循、李在、倪端、石锐等，画技都远逊于戴进，因而遭妒忌排挤。戴进被放归故里后，回到杭州后以卖画为生，终至穷途落魄而死。主要艺术活动和影响是在民间。明朝山水花鸟画首席画师，浙派创始人。

张嵩，原籍崖县（今乐东县）西界人，生于孔冗村，这村里的人以担柴叫卖为生。昔日崖县民间流传一首崖州民歌，唱的便是这村里百姓生活的艰辛，歌词生动有趣：

东孔赤龙与孔冗，
总是担柴人清消，（崖州方言，全部的意思）
一日砍柴得一担，
不够买酱与买盐。

张嵩少小丧父，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母子俩相依为命，住在一间低矮的草寮里。张嵩八岁开蒙，儿时就一灯读《尚书》“满招损，谦得益”；他的心眼灵通，一学便懂礼明义。十一岁读《滕王阁序》，他一学就会作文填词，在民间有“小神童”之称。

清光绪二十年（1895年），张嵩跋涉涉水，到广州应举考试。考官首先筛选出优秀试卷，再从中择优录取举人时，张嵩竟落榜了。

张之洞（同治三年进士）时任两广总督。发榜日，他亲自来到现场查看考生的优秀试卷，发现了张嵩的文章写得不错，不予中举，心感惋惜，因此把张嵩推荐给陪他同来观榜的广雅书院院长梁鼎芬（广东番禺人，张之洞幕僚，进士），让张嵩在广雅书院免费读书，以便来年再考。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嵩长途跋涉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他的文章独出心裁，考中了顺天榜的举人。如张嵩自己所说，从此，他是名亦香，姓亦香了。同年九月，张嵩荣归崖州。为了报答昔日梁鼎芬院长的扶翼之恩，他在途经广州时，顺便到番禺看望恩师。那天，在梁院长的宅院里，张嵩看着梁先生的一副自撰联：

三间破屋长相对，
一代完人不易为。

张嵩面对楹联，一看一点头，心里十分感慨，轻声地道一声：“梁院长，一生坎坷啊，请多保重。”

次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嵩回到了

林徽因建造「昆明客厅」

■ 周惠斌

1938年1月，梁思成、林徽因抵达昆明，开始了他们在春城将近3年的流亡生活。随着西南联大的正式组建，原先在北平“太太的客厅”经常相聚的一群朋友，诸如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周培源、杨振声、沈从文、朱自清、卞之琳、萧乾等陆续来到昆明，在离梁林住所不远的北门街附近比邻而居，他们或叙家常、或论国事，在战争的苦难中，重又找回了往日的温馨与梦中的记忆。

1939年初，日军频频轰炸昆明。林徽因随梁思成搬迁到昆明市东北8公里处龙泉镇龙头村附近的麦地村，在一所名叫兴国庵的庵堂内暂时安顿下来。由于战事趋紧，聚集到麦地村的文人越来越多，住房成为稀缺资源。身体欠佳的林徽因迫切感到应该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屋，于是她在临近的棕皮营村，向一位李姓当地人租赁了土地，双方协议：李家出借土地，梁林出钱建房，5年后房子归李家所有。

林徽因随后开始着手设计。新居自1939年年中开工，历时半年许，至1940年春建成，建筑面积约150平方米，由两排独立的平房组成。正房三楹五架，中间是书房和卧室，东西两侧分别为林徽因母亲和女儿的卧室及客厅。正房西面山墙外，后又加建了一小间低矮一些的10多平方米的耳房，有门与客厅相通，那是他们一生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寄居的房间。整个建筑与当地乡村风貌相融合，又独具特色，显得典雅、明净、大方。

灰瓦顶、土坯墙、花格窗、木地板……新居虽然简易，可选址、规划、设计、监造，处处显示出主人的建筑理念和文化素养。为了建造这所房子，他们耗尽了原本就不多的积蓄，甚至为此举债，一度陷于窘境之中。但是，在新居的客厅里，林徽因邀请“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傅斯年、冯友兰、金岳霖、李济、董作宾、王力、陈梦家、游国恩、查阜西……民国时期的文人们在这里话古说今，谈诗论艺，在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中，一同分享着人生的快意……（据《人民政协报》）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